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三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六期 ——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8b）

【回首文革】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王保春·王文耀
【当事者言】	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	阎长贵
【文革往事】	黎澍看戚本禹	朱瑞熙
【文革一页】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李定中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 王保春·王文耀 •

口述者：

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参加者：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

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

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时间：2012年4月19日

◇ 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

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这件事情没预先告诉江青，江青后来就跑到16楼，大发脾气，说我还是不是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这事情没事先通知她，她把稿子一看一改，给陈看，说：“我改这些是最最重要的！”至于她怎么改的我没印象了。

王保春（以下简称春）：陈起草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有什么事情要请示中央，他要约束文革小组的权限，说不能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江青恼火就恼火在这上面，她认为文革小组是最高的，只服从毛主席。

李：看来还是江青的理解比较透彻。我们看一些回忆文章，都有一个印象，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江青是实际上的当家人。通过您二位的叙述，我们知道了这里还有一个过程，大概从1966年8月底、9月以后，江青才实际上当家，这之前陈伯达还是说了算的。

春：这样说可以。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这件事情我也问过关锋。我说，是不是中央文革一开始就是江青说了算。他跟我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开始的一段时间，陈伯达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春：关于陈伯达说话看起来不太灵了，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总理主持，总理作报告要中央文革派人去（凡是有活动你中央文革都得派人去啊，你不去好像不承认似的）。陈就去找江青商量，江青不去。他又找其他的成员商量，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问了他们一遍，结果谁都不去。他有点为难，就去找总理讲，说：“他们都不来，我一个人也不好露面。”总理很精明，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这样吧，你不跟全体会议人员见面，你跟筹委会那拨儿人在后台见个面，打个招呼就行，让这一层人知道文革小组的人来过就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总理这次主持的会议文革小组不愿意支持，陈在中间夹着也很为难。最后陈自己去的，我和文耀都跟着去了，在后台跟筹委会的人员见了个面。

再一件事情。有一次聂荣臻跑到钓鱼台找陈伯达，说北航的学生（据说，这批北航学生不属于“北航红旗”——整理者）要开批斗会，在后库的一个体育馆，当时想让文革小组派人去，伯达说：“可以吧。”答应了，结果谁都不去。江青不点头，谁也不敢去——一去不等于承认了吗？权在江青手里头，陈没有办法，说那我自己去吧。那次我们两个都跟着去了（耀插话：还去西花厅和总理说了一下，说他们都不来）。后库那儿揪斗聂荣臻，一进去就听到有人喊，“打倒聂荣臻！”陈伯达就上来说：“不对、不对，你们不能那么喊，你们不能这么对待聂荣臻同志。你们知道聂荣臻同志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吗？他是刚从氢弹试验的前线阵地回来的呀！”这么一说以后，学生马上就改口了，高喊“欢迎聂荣臻同志！”刚从前线回来，他是我们的英雄。这么一改口性质就变了嘛。后来跟总理也汇报了。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外交部造反派，总理接见了一派，另一派也准备接见，突然总理病了，去不了了，就派他的秘书去（哪个秘书去的我记不得了）。秘书到那儿说我代表总理来见你们，总理身体不舒服，等他身体好了再接见你们。不听，在大会堂不走。后来没办法又派李富春去，造反派们还是不听。邓颖超就给陈伯达打电话，说：“今天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开批判陈毅同志的会，恩来原来准备去参加，现在因病得很重，实在去不成了，希望文革小组能去一下，让会早一点

散了。”陈马上要我陪他到中南海西花厅。他进客厅和邓颖超谈话，出来对我说：“已经先让富春同志去了，我回去再叫几个人一起去。”回到钓鱼台，到11楼找江青，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还是什么的，她不去，那就找其他的成员吧，结果找谁谁都不去。陈伯达没有办法。这就看出来，权不在你手里了，你就是一个橡皮图章，用你时盖一下，不用时不理你。

耀：去找关锋，关锋不去。就到16楼找戚本禹，陈坐在办事组门口等着，我进去找戚。戚的门关着，我就敲门，没回声，于是我就推门进去了，一看没人，后来我往里面床上一看，他盖着被子睡觉呢。我就叫他：本禹同志，本禹同志！他“呼咚”把被子一掀，坐起来，说：“你和陈伯达说，我不去，他要去他自己去，代表他自己，不要代表中央文革！”就这样子的。我说，那你不去了？他说：“我不去！”我说那好，我下去报告伯达同志。

春：后来我就陪他一块儿又到西花厅，我在外面，他进里面，说了一下情况，出来后，我说往哪儿去？他说去大会堂。我们从后面进去，一看陈毅在台上站着，下面人喊着口号。陈伯达一去第一句话就说：“给陈老总搬一把椅子。有错误有问题可以批评，可以批判，但是不能这样子。坐下来。”服务员赶快搬了把椅子让陈老总坐下。陈伯达就发火了，说：“你们不理解！总理身体不好，派秘书来说你们不听，派副总理富春同志来说你们还不听，这个地方是国家办公的地方，你们长期坐在这儿是怎么回事？嗯！”又说：“这样子不对，等以后总理身体好了答应接见你们，为什么这样不让步，不谅解？”说了一通之后就走了。回到钓鱼台，刚一进办公室，他就说：“王保春你打电话给大会堂问一问，看他们散了没有？”我就赶紧给警卫处值班室打了电话，问外交部在那儿的人群散没散，他们说：“在陆陆续续往外走呢。”放下电话我就给伯达汇报，陈说：“那就好！”

◇ 江青和陈伯达的几次冲突

李：后来江青和陈伯达又有很多的冲突，应该说是太多的冲突。您还记不记得都有哪些具体的事例？您见过没见过，江青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儿和陈伯达发生冲突？

耀：我听陈说过江青摔杯子的事情。1968年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11楼开会，他回来以后就躺床上发呆。我看他回来了，就把给他整理的文件送过去，一进去我看他的脸色不好，我说您怎么了，是不舒服吗？他说没什么。再等了一会儿，他说刚才11楼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她摔杯子。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的那个李希凡，说我把他逼到绝路上了。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也没怎么去，怎么我把他逼到绝路上呢？我说现场还有谁呀？他说还有康老，还有那两个人（指张春桥、姚文元）。后来江青还拿出来一封信给我看，说康老说了，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陈说他看过这封信，辩白了几句。江青大怒，抓起杯子“啪”地一声摔到地上。他怕让工作人员看见了，所以就把它给捡起来，用报纸包回来了。他还说江青训他就像“三娘教子”似的。陈说完以后就把报纸包着的碎杯子给我了，让我放好，不要扎了人。他后来还说了一句：看样子江青有点后悔。

我想往哪放呀？江青我们可惹不起！15楼对面有个河，我在河边刨了一个小洞，埋在里面。埋了一段时间，心里又放不下，我想要是园林工给刨出来拿走了往哪儿去找？我又刨出来，放在17楼的河边。陈因和江青经常闹别扭，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了，搬到米粮库，我又把这个碎杯子挖出来，埋在米粮库的小花树的树根儿底下。来回折腾这么几次。说实在话，我真怕江青找来。

李：这是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

春：再就是整治我的那一次，整得很厉害。1968年3月8日，这一段陈伯达情绪一直

很低落。那一天正好是有些垂头丧气，吃完晚饭他说出去散散步，文耀陪着出去的。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文革办事组来了个电话：“王秘书，傅崇碧同志来了，在东门，你报告首长。”我说，首长不在出去了，他就挂了。过了没有两分钟，李讷又来电话，我一接，她说：“傅崇碧来了在东门，找你们首长。”我说首长不在，她根本不听，“啪”把电话挂了。当时李讷是办事组组长。什么事呀？我一琢磨，我想傅崇碧被堵在东门不合适吧，就想赶快找到陈伯达，就给警卫处打电话说，你们马上派辆车沿着去颐和园和香山的路，把首长给追回来，家里有急事。首长出了北门往西散步去了，具体不知道去哪儿，但有警卫车跟着。一方面安排去追陈，另外我就赶紧给东门传达室去了个电话，我说傅司令员在东门吗？他说在。我说赶紧把他请进来。我想你进来等着，我已经设法去找陈了。他进来以后没有到我们15楼，直接奔16楼去了。为什么他急着进16楼？原因就是急着找鲁迅手稿。前几天许广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鲁迅先生的很多手稿遗失了，请想办法找回来。总理好像是在碰头会上给陈伯达说这件事，开完会回来我记得都12点多了，陈说：王保春你给我要杨成武的电话，我说好。军用机子，一要，杨成武是散了会刚进门，他的秘书接的，交给杨成武，这边陈就讲鲁迅先生手稿遗失的事，交代他一定想办法找回来，杨成武跟他说：“好，我尽快布置。”杨成武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傅崇碧，傅崇碧就到鲁迅纪念馆问，说文革小组的人取走了；当时文革小组的人谁取的没有具体说明。一查，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已回到成都59军，用飞机把那个人（阎插话：此人名字叫韩树信）接回来查问，他说，鲁迅手稿就在16楼的保密室里。傅崇碧恨不得马上找到，于是急急忙忙到钓鱼台来。所以他一进钓鱼台，就直奔16楼。开始是姚文元接待的他，江青很快也来了，并发发脾气：“傅崇碧，你干什么？为什么要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详细过程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现场。这边也把陈伯达追回来了，他直接到16楼。陈回到15楼说：“王保春，傅崇碧进来是你批准的吗？”我说，是呀。他说：“你怎么不请示呢？”我说，你不是不在嘛。“你不请示你就把他放进来了？”我说他不是经常来嘛，没有人告诉我他不能来呀？陈说：“你私自把他放进来不对，要写个检讨。”没办法，叫写就写吧。我就写了一下经过。16开的纸我写了一张。陈拿着我写的这份“检讨”就走了。谁知道给江青一看，江青说：“这是什么检讨？没有触及灵魂，没上纲。”陈又回来了，跟我说：“这个检讨得重写，不深刻。”我说：“怎么不深刻呀？就这么个过程，还怎么深刻？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觉得我这样做还是很有礼貌的。他说：“别说那些话。”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也生气了，他就拿起铅笔替我修改，又加了几句话：狂妄自大，自作主张，不经请示任何人把傅崇碧放进来。我就又重抄了这个检讨，我还加了几句，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我各方面水平都很低，我要求马上调离。我抄完后，陈伯达拿着又去了，后来他回来再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看到文耀跟他说：王保春的检讨中央常委都传阅了，周总理、康生都圈阅了，江青还有个批语：“责令王保春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深刻的检查，其他工作人员引以为戒，至于别的问题请伯达同志酌情处理。”

杨：江青对你够客气的了。（王保春插话：是的，没抓我！）江青要是生气了，说把他弄走，那就糟糕了。

春：没过几天，我陪陈伯达到另外一个楼开会。首长在里面开会我在外面休息厅等着，后面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江青，她第一句话就说：“王秘书，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啊！”我刚要回话，一转身她进卫生间了。回来我和文耀两个人分析江青的话是什么意思，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好像她的意思是说这件事主要不是对着我，而主要是对着首长。我说只能这么理解。

后来我不是还没走吗，有天陈伯达犯愁了：“你到哪儿去呢？”我说：“回宣传部吧。”他说：“不行，宣传部现在两派闹得那么乱，不好相处，不能去。”那到哪儿去？到江西五七干校？后来琢磨琢磨也不行。

在这之前有个什么事儿呢，康生和江青在一次会上攻击他，阴阳怪气地说：“现在各部委都在办干校，老夫子管的单位大概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吧。”他那个时候主要管两个单位，一个是马列主义研究院，一个是《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实际他也管不了，姚文元在管着呢，其实他就剩下一个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样一弄他回来就犯愁了。他想来想去，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提议解散马列主义研究院，还恢复延安时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院里原来有二百多人，少留几个人就可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主席很快就圈阅退回来了。退回来就开始安排这个事情。谁去操办呢？陈伯达就把这事安排给我了。这样，我也就躲开江青了。

我跟陈伯达说，研究室要选几个人啊？他说，选十几个就行了。条件是：第一历史要清楚；第二有一定学术水平，能写文章；第三不是太出名的。当时选的人本质都不错，全国大专院校拔尖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为什么要没有名气的人呢？他就怕江青他们抓他的辫子。我和工宣队的几个人一块帮助选拔这十几个人，当时我就住在颐和园那里，整天一起研究选拔留任的人。他后来又说选七八个人。我说你成立一个单位就选七八个人没法弄，人太少。我说：“行政人员不要？”他说：“不要。”我说：“你既然是一个中央单位至少得有个秘书长吧？”他说：“不要秘书长，有一个秘书就行。”当时有个史敬棠，是从延安出来的，跟他干了十几年，还给毛主席管理过书报，后来就叫史敬棠当秘书。他说，一个中央的单位也可以不要官。后来选定了之后，拿出名单附上档案给他看，一个一个审查，最后他点头了。从二百多人中留下来十七八个人，成立了研究室。其任务，就是搞调查，找资料什么的。

耀：糟糕的就是跟着他的人没有一个有职务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包括史敬棠等人，他也不给官当，他也是只让他当秘书。所以姚洛（曾做过陈的秘书）文革之后都不愿见他，也不说他什么好话。

阎：姚洛“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国际组组长，“文革”后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他不是一次跟我说他对陈伯达的三条评价：1。有学问；2。没有行政工作能力；3。心术有些不正。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我这里插一句，在你放傅崇碧进钓鱼台这件事情上，江青对你说“对不起。”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她非得制造成一个事件，本来你放进一个这种人物进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她要故意把这个事情弄大。

春：是这样。

杨：关于“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事，我再说几句。这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出来的。

◇ 大家都知道江青惹不起

春：3月24日以后我就没事了。后来我就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搞了个班子组织政研室，搞了几个月。组织起来之后就准备“九大”嘛，等于组织完政研室又把我弄回来了，也等于我一直没有离开陈伯达，后来华北会议批李雪峰时，有人批判他说：“你是学了陈伯达那一套，陈伯达把王保春给藏起来，你把黄秘书也给藏起来，藏到石家庄。”

李：把你藏到米粮库了？

春：对，藏到米粮库了，他出去我不跟着出去，我留在家看家。

杨：江青跟我说过，保春是个老实人，还算是个好同志。

春：江青谁也惹不起她。“文革”初期，江青还经常往陈伯达15楼那儿跑，有一次，江青看到一层摆了个乒乓球案子，说，还有个乒乓球案子呀。让她的警卫员孙立志陪着打，孙立志说：“王秘书打得不错。”我在后面吓一跳，要是真打起来我怎么接球呀？如果我接不住就倒霉了。

杨：江青后来，把张春桥、姚文元找来，狠批了一顿，说：“你们俩，我在陈伯达那儿辩论，你们俩一声不吭，什么意思？没有是非观念？”所谓没有是非观念就是没有给她帮腔。

郑：大家都知道江青惹不起。

春：除了康生别人谁都惹不起她，你看康生对江青怎么叫？

杨：直呼江青其名。

春：就康生可以不买她的账，一进门噼里啪啦地就喊：江青！别人都不敢惹她，见她都害怕。

阎：除了毛主席直呼江青其名外，在党内高层这样叫的就只有康生了。这大概从延安以来的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康生不惧怕江青，他后来给江青提供什么材料，不是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呈江青同志亲启”嘛！

郑：康生对江青直呼其名，陈伯达呢？

春：叫“江青同志”。在下面我们都是叫代号，叫“11楼”。

◇ 只要江青一发现陈伯达到主席那儿去，回来就批评他

耀：陈伯达受许多窝囊气。主席批评他，说你现在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你也不写文章。陈当然不敢吭声，回来跟我们说。我说你怎么不说江青不让你去呀？他说“我怎么说呀，我一说不等于告江青的状了嘛。”为什么不能去？只要江青一发现陈伯达到主席那儿去，回来就批评他，说：“是不是昨天又去主席那儿了？主席有什么指示，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主席年龄大了，你到那儿说话罗嗦，都说什么了？”过去他到主席那儿非常随便，陈的住处和主席住的游泳池一墙之隔，他有时就去，也不让我们跟着。他去了就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客人，睡没睡觉？说，没有。他就进去，和主席在一起交流聊天。可是后来他只要去过，一回来，江青就急，就逼他传达；陈说一点，江青就说，去那么长时间，就说这么几句话？给你说过多少次，没事不要去打扰主席，你就是不听！？所以陈伯达就不敢去了。要不就偷着去。有一次，他悄悄地去主席那儿。第二天会上江青就问他，你昨晚去哪儿了？陈回答，回家了。碰巧那天是礼拜六。康生在一边阴阳怪气地搭腔：“噢，老夫子还回去过礼拜六。”江青说：“你去主席那儿，回来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你封锁最高指示！”陈回到住的地方，苦恼地跟我们说：“我只是和主席说些不成熟的问题，主席也没说让我传达，我说了主席不怪我呀！”

李：这是什么时候？

春：是“文革”开始以后，“文革”以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郑：从什么时候陈伯达不敢去了？

春：那就是1966年国庆节他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很少去了，一去就受江青的责问。

耀：后来就更不能去了，一去回来江青就问：“你是不是又去主席那儿了？”批评他，他特别难受。1968年，陈去主席那儿，主席批评他：你现在官做大了，不到我这来了，也不自己写文章了。他心里着急，我心里更急，催他赶快动笔写。写什么？他不愿意写“文革”，想了一阵子后，决定写国际问题，我们为他找材料。动笔不久，他夫人刘叔晏一天晚上来了，小声跟陈说，女儿学不能上，在外边造反，让陈为女儿找个工作，以不让她到处乱跑，惹祸。因为刘和陈不住在一起，刘走后，陈很犯愁。平时他要求我们很严，这时他在想为自己孩子如何求人。他刚走到办公室的电话前，正好我拿着写文章的材料急忙走过来，看到他要为孩子事求人，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他一听，愣了，生气地说：我就不知道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电话也不打了，回头到卧室去了。这时我一下子醒悟过来，赶快到他卧室，看到他生气地躺在床上，便悄悄地到他床前向他表示：伯达同志，我错了，很对不起！他轻轻地说：没事，你去吧。我放下材料，回到我办公室。结果深夜，服务员给我打电话，说快点，首长要出去了。我一听，赶快下楼，上车，和他坐在一起。我问：咱们上哪里去？他没理我，和司机说，“老俞，到西边去”。他心情不好，就跑到钓鱼台西边。那个时候钓鱼台都算郊区了，夜里没路灯，黑乎乎的，路上也没人。他让老俞停车，然后就下车了，不理我。他在前面走不说话，只是散步，我紧紧跟着，后面还一个随车跟着。散完了步以后和老俞说“回去”。回来以后就上楼，躺在床上，我都没话说了。第二天，他就跟王保春说：这王文耀可不得了，昨晚上跟我发了很大的脾气……“什么不写文章，什么不知道是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用他来指挥我？”他叫保春和我谈谈。保春说：“是，我批评批评他。”接着又劝他，文耀年轻不懂事，你别计较。经保春调解后，我们的关系又缓和了。他的文章也写了。写好以后我们挺高兴的，说这下行了，送给主席，主席不仅画圈并批示：“此文可用。要在小组会上讨论。”小组开会回来后，我们问他怎么样呀？他说：“没谈。”就是说没有讨论这个事。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对着他说：“你的文章主席说了，根本不精彩。”我说，主席有批示的，说可用呀，让回去讨论。他说：“江青这样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了。”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阎：文耀说他和陈伯达发脾气。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恐怕连想也不敢想，是不是老杨？

杨：对。别说跟她发脾气了，你老老实实为她服务，还找你茬呢！

◇ 后来陈伯达实际上成了很孤立的人

耀：陈伯达太窝囊，我们也受不了呀。把保春撵走了，我自己还能在这儿干几天呀？他这里的工作有时候真不好干，比如康生一来，我们很高兴地招待他，请坐，倒茶，我们马上报告陈伯达，而康生在会上对陈伯达说，你那个秘书可是不得了，到你那儿去很不容易。

李：为什么康生这么说？

春：你把他挡在客厅，给他沏上茶，你进去报告陈伯达，他不满意，他想直接闯到陈伯达屋里，不受任何阻拦。

耀：意思是说秘书阻拦他进去。他就想直接进去。戚本禹后来到陈伯达这儿就是这样，直接进，有天护士说首长在睡觉，他也不管直接就进屋了。

郑：戚本禹毕竟年轻嘛，不把陈伯达当回事，像康生这么大岁数了，应该有分寸呀？他到江青那儿肯定不敢吧？

耀：因为江青要换我们呀，几次要换。我对刘叔晏也很有意见，我告她的状。后来陈伯达就说，她（刘叔晏）对你们还是挺不错的，江青几次要求换你们，她说不换。江青要换，陈伯达就是一句话：“生人来我不习惯”。后来陈实际上成了很孤立的人，孤孤单单的，在上面老挨批，主席那儿又不能去，他夫人也不在，所以有些话都没有地方说去，有时候只能和我们叨叨几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离开。那边文革小组一直是想要换掉我们。有一次，广州军区来了一个电话，说：“是伯达同志这儿吧？”我说，是。电话里说：“让我们给伯达同志挑两个秘书，我们找了，这两个同志一个是全军的劳动模范，一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挺不错的。”我一听这事不好办，我说这样吧，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就告诉谁，你不要告诉我们这儿。我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没多久，戚本禹就来了，直奔陈伯达那儿，出来就发牢骚：“那个时候跟你说你同意，现在又不同意了。”陈伯达说，陌生人来我不习惯。戚本禹就很生气地走了。

杨：陈伯达真够可怜的，你们都敢跟他发脾气，戚本禹更不用说了。

李：对陈伯达戚本禹当然有恃无恐，在江青面前，恐怕是不敢放肆的。

阎：你说得对。我给江青做秘书后，戚本禹居然有一次问我：“我到江青那里要注意什么？”我没说他要注意什么，他和江青的关系比我好，对江青的了解比我清楚，我能告诉他注意什么？——确实我也不知说什么。我只跟他说，江青对你的看法挺好，她说：“就是戚本禹比较关心我。”戚本禹对陈伯达那样不放在眼里，别说对江青了，对康生他也不敢。在我还没给江青当秘书前，因为在戚手下工作，有一次他带我到康生那里（钓鱼台8楼）去，在路上，戚问我：“康老怎么样？”我说不知道——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康生需不需要打倒？当时在他脑子里仿佛除了毛泽东、江青、林彪，谁都可能和可以打倒。戚对周总理说不上很尊重——大概受江青的影响，但他很赞赏总理对大字报的态度。他说，康生、陈伯达一看到有人给他们贴大字报就急得不得了，而总理很大度，说：“让他们贴去哩，我不怕！”王力、关锋倒台后，总理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止一次赞扬戚本禹，有一次戚跟我说：“总理这样做，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扯远了，回到对陈伯达的态度。不仅戚本禹，还有王力、关锋，他们三个人，对陈伯达的态度都不好。陶铸倒台后，在钓鱼台16楼会议室，我亲眼看到王、关、戚三个人奚落陈伯达，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逼得陈伯达当场说出这样的话：“请戚本禹同志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对陈这样说，我感到很惊讶。我分析，陈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他知道戚和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也是警告戚，你不要在主席、江青那里告我的状。

耀：是。因为当时这个倒了，那个倒了，陈伯达上面惹不起，下面也惹不起，所以他很窝囊。

李：您说陈伯达经常和您二位发点牢骚，说点话，他主要都说些什么样的话？

春：陈伯达跟我们说过，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江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不是，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这是主席生气的时候说江青。这类的话，主席肯定是说过。在公开场合，陈伯达哪敢说呀？只能回来和我们念叨念叨。

耀：关于这类事情，陈伯达对总理也有埋怨，他和我们念叨过。主席对江青经常有所批评，陈伯达说：“总理也不在会上传达。总理不传达其他人也没法说啊！”

李：陈伯达背后发江青的牢骚吗？

春：他当然不满江青，他根本不愿意在11楼待。

阎：江青看电影他也很少去。不过有一次他倒告了我们一状。有一次江青跟我说：陈伯达同志来了，你们要对他热情一点。我们感到很冤枉：我们什么时候对他不热情了？我们工作人员敢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在我们眼里和心里还是有威信。当时我跟保春议论过这件事情。后来想，陈伯达这话很可能是说给江青听的——只是拿工作人员当借口罢了。

春：对，你跟我说过这个事。“文革”初期，不是有文革小组会嘛，陈伯达召集和主持，后来弄不下去了，他不愿意参加，他就不开小组会。后来主席定的由总理来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从这以后他就愿意参加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他不召开和参加文革小组那几个人的会，他想躲避。江青想出一招，叫大家到17楼看电影，看到半截，停。一停灯亮了，工作人员退出去，他们几个人就商量事情，江青、姚文元、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你（指阎）可能也碰上过，反正我们碰到过几次，临时开。（阎插话：对这类事我没印象了。）后来陈伯达明白了，就总是躲着，叫他去，他说：“我不行，我头晕、头疼，要不然说我吃了安眠药了，我不看，让他们先看吧。”服务员要是说：“不行，江青同志和康老在等着呢，你不来他们不开演。”“你叫他们先看吧。”他电话中老这样说，他老想躲着，拖着。他说一看电影就开各种小会。他的意思很明显，中央文革这个会我不参加，我要参加就参加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就这样闹得比较僵。文人就那样，以柔克刚，肉不叽叽的，抓不起来那个劲儿——你想骂就骂吧，我听着——有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有的时候他和江青坐一个车，坐在江青车上，那是想怎么骂怎么骂，想怎么说怎么说，车上的护士听到后，有时也告诉我们一下，在这方面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和我们关系很好。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

~~~~~

# 【当事者言】

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

• 阎长贵 •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兹择要整理如下。

## 一、关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

阎长贵（简称阎）：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戚本禹（简称戚）：搞批判，或者说搞大批判，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我是搞历史的，就选择了批《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他们后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原来打算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改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为了写批《清宫秘史》的文章，“大闹怀仁堂”即被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会都没参加。

阎：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刘少奇不承认啊？

戚：他说过的，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按：北京电影制片厂

《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检查，说：“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个检查。——笔者）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八国联军进北京，珍妃跟光绪说，不要走，留下来，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们斗。主席说，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卖国主义。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主席都提出来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方妥协，用了“胡××”，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希望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总理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一类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别人没说什么，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当然是我。这样一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再说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的八个问题，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扩大而成的。说实在话，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主席看过和修改过，还经过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笔迹。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说明实际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对写这篇文章，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是积极地自觉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荣和高兴。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这是不对的，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阎：是否请你谈谈成立“大批判组”搞大批判的情况？

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在1966年秋冬从《红旗》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于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

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我，有没有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记不清了，成员有10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员之一吗？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我。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阎：对，我是成员之一。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大批判组”的事我基本没管。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记得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化语。“大批判组”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两段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印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泽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大批判组”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

值得说一说的，在“大批判组”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她对我说：“你能写文章，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嘛。”我说：“没时间。”江青有点不高兴地说：“抽时间嘛！”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当时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说心里话，江青既然叫我写，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这有点表现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内容的文章来批。你还记得不，大概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出事，我问你：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林杰看看，提提意见？你很坚决地说：不要了！你也没说原因，我也没问你。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我是在事后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后给《解放军报》发表——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把文章送给陈伯达时，他说不看了。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把文章题目《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加了一个“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发表，李讷当然满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是这样吗？

戚：不是，不是！华岗不是他整的吗？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是我的同学，他生前跟我说，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来了。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可以想想看，我们的领导人谁没整过人？据说，陆定一就说过，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客观地说，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

##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批示内容是：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1967年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挥泪斩马谕”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倒陈再道式的人物！”“打倒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道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这是瞎吹；

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这也是一个平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 i n g”，而念“j i n g”。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嘛！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 三、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

阎：现在很多书（包括王力的书）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戚：在这个问题上，你批驳王力很好，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说得对，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同。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如刘少奇、林彪等面前这样做？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江青。不错，在会上，江青经常说“总理，你总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并不是要打倒总理。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难道她不知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总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在军队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没掌握；在政府方面，总理威信很高，绝大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都听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他所以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人说我反总理，这完全是编造。总理一直对我很好，曾赞扬我是“青年历史学家”，要向我学习，还说我办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时，总理一晚上三次打电话慰问和询问，如此等等。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

我认为，总理在“文革”中态度很好，姿态很高。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人贴了（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它覆盖起来。总理总说，叫他贴嘛，覆盖它干什么，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坏人，也让他暴露嘛！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如果连贴我的大字报也不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放出来。本禹同志，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阎：你讲这些，我觉得符合事实。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过；你说康生、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不得了，总理很坦然。

戚：听说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总理，那我就知道了。

#### 四、关于林彪事件

阎：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触频繁，交谈甚洽，她对她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怎么看？

戚：她要为父亲翻案，当然对主席不满。但她很有气质和风度，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随波逐流，我很赞赏她这点。

你说林彪是“反革命”吗？当然，他如果真地要暗杀毛主席那无疑是反革命了。但这有什么确实的根据？林立果搞那些东西都是小孩玩意，林彪知道吗？有个被称作林彪或林立果亲信的名叫做李伟信的人，他在林彪事件后，几乎没受到什么处罚，现在他在上海做买卖赚了很多钱，国内国外到处去，很出风头。这很蹊跷，他和林彪、林立果到底什么关系？

阎：说林彪是“反革命”，我觉得没充分根据。我认为，说林彪是“反革命集团”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很注意这个用法的变化。我看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只用了“林彪集团”的说法，我跟别人说其“定性”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两个说法都时有出现。所以上次见到豆豆时，她对《华国锋同志生平》中没用“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很满意。我跟她说，在11月份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用了“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见。对林彪的宣传目前似有所松动。而关于林彪问题在学界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

戚：我听林彪的一个秘书讲，林彪外逃，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

阎：这正是豆豆的观点。她认为她父亲外逃是被她妈妈和弟弟挟持、胁迫的。说实在话，林彪走上这一步，与主席处理不当也有关系。学界有种说法，“九一三”事件是毛主席“逼”出来的。关锋也说，1971年8—9月，毛主席到南方一路上到处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讲军队的问题，说这个问题还没完，说陈伯达还有后台，这些话林彪能够听不到吗？能够容忍得了吗？

戚：主席在1971年8—9月的做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刚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怎么又这样呢？主席在南方的谈话是谁向林彪报告的呢？

阎：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没怎么研究过。林彪事件或者说“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刺激很大，大病一场，几乎从此一蹶不振。在“七二零”事件后，毛主席曾引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反映自己的心态，我看这两句诗不仅是他“七二零”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写照。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局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吧？！在“九一三”事件后，主席是这样，江青又怎样呢？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说：江青夜里经常做恶梦，什么林彪、叶群向他索命，等等，吓得她睡不着觉。第二天，她把这个梦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梦都是虚的；她也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个，等等。这是否也反映一种心态？也可说明一点问题？江青直到1971年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的前半天，她还公开夸耀林彪送给她的几个西瓜，在游览颐和园时，切西瓜给工作人员吃，并表示衷心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

戚：难道江青一点也不知道林彪对主席不满和反对主席？这这也是一个谜。还有“九一三”事件后，即获知林彪等人摔死温都尔汗后，总理大哭，不知为什么？

阎：对总理的哭有各种解释。确实值得玩味。

## 五、关于田家英的问题

阎：我在网上读过你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我还向别人推荐和介绍过你这篇文章。

戚：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阎：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说田生前曾说过“刘公为什么不造反？”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他，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种程度。“刘公”即刘少奇。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当然，田家英自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主席为什么不信任他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

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主张向毛主席报告。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这样一来二去，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

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这完全是胡编。我从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很器重，很培养，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人总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这样的批评：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怎样，我不怪他们，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

阎：不是说你参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谈话吗？其情况是怎样的？

戚：是，我参加了，我和王力是陪同当时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谈话。1966年5月22日（即田家英自杀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到田家英那里，安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了。”我和王力都没说什么话。在那样场合和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坊间一些书籍，说什么安子文谈话就像训人，气势汹汹，这完全是瞎编。

阎：听你这样一说，我对田家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里也听到关于田家英的一些情况，是零零星星的，不连贯，不系统。你今天谈的，帮我总结和概括起来了。

戚：在田家英问题上，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我认为，田家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是党内一个很难得的高级干部。他的自杀不是什么自绝于人民，什么叛党，而是很可惜的。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阎：你说的对，我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若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懂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 原载《往事》第一百一十九期（2013年3月29日出刊）

~~~~~


【文革往事】

黎澍看戚本禹

• 朱瑞熙 •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文革小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其中黎澍同志最严重的“罪状”，是肆意攻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戚本禹。按照当时的“极左”思维和逻辑，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我和近代史所的部分老同志刚从江西丰城县搞“四清”回到北京，很多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揭发黎澍同志的，也不清楚这条“罪状”的依据。

1968年年底，上面派来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我被调入本所历史问题专案组，负责审查几位老同志的案件。其中，黎澍同志的专案材料就转到我的手里。前一阵，我因为搬家，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偶然从1969年3月到8月的笔记本中，发现了黎澍同志亲笔写的题为《关于戚本禹》的材料。因为我手里藏有他好几封信的批件及信封，熟悉他的笔迹，虽然这份材料最后没有署名，但判断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加上我还记得文革初期他被揭发“攻击”戚本禹这件事，所以肯定这是他写的。

在文革中，这种材料被称为“交待材料”。黎澍同志使用了1966年10月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生产的稿纸，红格，纸较薄，纸质较韧，每页400字，用单面的复写纸复写。我手头的这份是复写纸复写的一份，共5页。当时应该有一式两到三份，其余几份估计在文革结束后已经销毁了。

今天看来，这份材料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首先，这是黎澍同志的亲笔文书，对研究和编写他的历史是第一手的资料，值得收藏。这份材料显示他为人正直、真诚，对后进的提携、关爱；又显示他目光敏锐，别具只眼。其次，从文革史的角度看，这是记述戚本禹此人在文革初期，如何从飞黄腾达、一步登天、不可一世到迅速垮台、自食其果的过程，是研究戚本禹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再次，对探讨文革初期中宣部领导人周扬、林润青等的作为，有一定的价值。第四，对评判这份材料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的人品，也有参考价值。从中，后人可以猜测文革初期黎澍同志的这条“罪状”是刘揭发的，这在当时可谓重磅炮弹，足以置人于死地。以下是黎澍同志《关于戚本禹》的全文。

关于戚本禹

1966年五月初，戚本禹批判《北京日报》和《前线》的文章刚在《人民日报》登出来，我对刘大年加以评论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看这个人不但是这篇文章写得好，而且会很快上升，不过摔下来也会是很快的。”这话总结了我对戚本禹的印象，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一个相当准确的预言：戚本禹上升了，又摔下来了，时间一共才不过一年零八个月。

我大概可以算得是戚本禹的一个比较早的支持者，他的那篇《评李秀成自述》是根据我的意见发表的。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1963年九月十四日中宣部召集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的会议上受到了周扬的批评。戚本禹对我是感激的。到1964年毛主席指示公开讨

论李秀成问题的时候，我找戚本禹写文章，他立即把他的第二篇文章《如何看待投降变节行为》的初稿交给我。他说，他要出差了，全权委托我修改。他对我表示非常信任我修改他的稿子，不论我作什么修改，他都是乐意的。当然，他的稿子最后还是由他自己改定的，我没有替他修改，但是他对我讲的这些话说明当时他同我的关系很不错，至少他还没有把我看作敌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并且把《历史研究》在前一年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也转载了。戚本禹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出现的人才，紧接着就被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5年十二月，中宣部决定组写三篇“重点”文章对吴晗进行批判，指定我负责组写历史人物评价一文。我一时没有想到适当的合作者。林润青建议找戚本禹，他知道在李秀成问题上，我同戚本禹观点一致，戚本禹是个可以合作的人。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我的同意。这篇文章计划分三部分，我写第一部分，李龙牧写第二部分，戚本禹写第三部分。当时我对吴晗问题还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就委托李龙牧在写第二部分的时候，连第一部分也写了下来，以便我有时间研究吴晗的作品，最后把这篇文章改出来。所以这篇文章的初稿实际上是由李龙牧和戚本禹执笔的。李龙牧和戚本禹两人写的稿子比较起来，李龙牧的稿子是差的。交稿以后，戚本禹拿去改了一遍，就发排了。戚本禹对我表示了对李龙牧的不满，同时对这篇文章不受中宣部重视感到遗憾，说后来署名方求的那篇文章，“周扬同志亲自参加讨论，逐字逐句修改。”言下很是羡慕。这篇文章排好清样以后，戚本禹立即交给林甘泉，要他全面修改一次。林甘泉作了很大的修改，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此时已是1966年一月初旬了。我决定集中全力来修改这篇文章。我的最初两次修改稿印出以后，戚本禹还是热心的，他总是先征求中宣部意见，然后来同我进行讨论。“‘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复辟’不能提，林润青说的”；“‘吴晗是胡适的门徒’不能提，许立群说的”。这是我至今还记得的戚本禹对我的传达，而且在当时他是很坚持的。后来这篇文章一直拖延到三月底，易稿十次，才算勉强完成。原因是这时《红旗》杂志决定投入这场战斗，戚本禹对这场战斗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他不仅要做好《红旗》杂志的工作，使《红旗》走在全国报刊的前面，而且他本人还要大显一番身手，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样，他就感觉正在由我加工修改的文章首先同他发生了矛盾，他必须尽力加以阻挠和破坏。我最初对发生在戚本禹思想上的这个变化缺乏了解。我修改出来的稿子照例首先送给戚本禹提意见，把他看做是最可靠的合作者。可是戚本禹的反映越来越慢了。后来我就发现一系列使我不能不感到奇怪的事实：

（1）我的修改稿里面提出的一些还没有人提出的比较新颖的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使我不能不放弃这种已经显得陈旧的论点，重新去找更新的论点，当然这些论点出现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很难说不是《红旗》作者首先提出的，可是在我思想上始终是一个疑团。

（2）《红旗》印刷厂通知我，这篇文章的修改在他们那里不能作为“急件”处理，戚本禹也向我诉苦，说是印厂实在太忙了。我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不中途把稿子转移到《人民日报》去排。

（3）我多次向戚本禹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做出很神秘的样子，拒绝见告。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迹象，我逐步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戚本禹为了抢先，有意使我落后。我只得下定决心，少了戚本禹这粒鳖（“鳖”字应为“蓖”字——编者）麻子也榨出油来。我认为无论如何，批判吴晗这个大方向总是不会错的。那怕落后，我也要独立把这篇文章改写成功。可是这么一来，我同戚本禹的关系就坏定了。

我从我同戚本禹的这些直接的接触中，判断他是个缺乏思想改造，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的人，强烈的个人主义支配着他的行动。他抱着个人野心，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做《红旗》杂志的工作。他的长处思想敏锐，文词足以动人，可是由于他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这种长处恰好成了为非作恶的本钱。而且因为有这么一点本钱，他对人家的评论总是语调傲慢，火辣辣的，全无半点平等待人的普通劳动者的朴实态度。这样一个人，看准了风向，在一个大的斗争中一时行动合乎规律，很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上升以后，因为缺乏思想改造，举动乖张，露出本来面目，很快摔了下来，也是合乎规律的。

这种观察，当初无非见微知著之谈，在为大量事实证明以前，是谁也不会相信的。甚至我自己，也未免疑是疑非，只不过内心有所保留罢了。因此不能向上反映。可是我对一个人讲了，也就等于对许多人讲了。当时戚本禹的表演还刚刚开始，要人们也对他采取保留态度，实在太困难了。我受到责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戚本禹的表演已告结束，真相大白，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教训。

1968年2月24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  
【文革一页】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 李定中 •

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他上书毛泽东惹出大祸一事，我是亲历者。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整版的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约稿和初步加工的，另一篇短文则是我动手写的。现在我写出本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介绍王若水同志有关的深刻分析，以纪念这位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

#### （一）林彪叛逃摔死后的形势回顾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与毛以及与“四人帮”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得知毛泽东已平安返京，就在夜间匆忙乘机出逃，并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荒野。当时毛亲自动手与领导，并得到林紧跟配合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5年多，各地各单位群众派性对立并未消除，不参与不干活的“逍遥派”却不断增多。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无政府主义泛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稳住局面，毛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他要周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并兼管《人民日报》。周利用毛对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态度有所松动的时机，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有的病体得到了必要的治疗，有的安排了工作。当时《人民日报》一直在张春桥特别是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之下，新的领导班子还未成立。周要当时工作能力很差但主持《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张、姚的亲信鲁瑛报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领导小组”名单（也叫“看大样名单”）。后来鲁瑛报的名单中除了他自己与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外，还有吴冷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林彪摔死后他写信给毛，表示要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毛批示说：“欢迎进步”。）与王若水。王若水从此分管报社编辑部的理论部、文艺部的业务工作。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抵制、控制“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减轻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危害。在批林整风中，他反复强调了要批林的极“左”思潮及其重要表现的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周对外交部干部讲话中又讲要批极“左”。他强调“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9月他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些精神传到《人民日报》后，大家都很振奋。当时理论部负责人是胡绩伟同志。他原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这时刚解放不久，负责理论部的工作。在他主持下，理论部拟定了一批组稿计划，其中批林彪的极“左”以及无政府主义，就成为重点选题了。

## （二）《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当时我在理论部工作。根据上述精神，我组织了两篇批林彪无政府主义的论文。一篇是约请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另一篇是约请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

1972年3月，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同志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专门约黑龙江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当时黑龙江无政府主义严重，许多厂矿，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大厂矿，毫无纪律可言。职工无故缺勤，生产无人管理。华、李、余当场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此，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也很乐意写篇反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论文写出后，作者署名“龙岩”交给了我。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不久前曾给我们写过稿子，质量不错。这次约请他们就批判无政府主义问题再写一篇，他们也很乐意。不久稿子送来，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两篇约稿我编好后交给胡绩伟同志，他审阅后同意见报。于是我又将这两篇稿子交给王若水同志审阅处理。

王若水认为龙岩的文章经过再加工修改，可作为头条来用。当时我送去龙岩的文章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王若水同意这个尖锐的题目，我对他建议，为了见报顺利，题目也可改得平淡一些。他点点头，表示由他相机处理。不久，王若水将龙岩的文章作了很大的修改，对另一文章改动不多。他通知我上述两篇文章准备拼一整版，但还有约一千字左右的空白，需要马上写出一篇千字文拼成整版。当时他手头有个介绍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小册子，希望我尽快翻阅一下，写个介绍这个小册子的书评。于是，我抓紧时间将书评写出交给他了。当时，张、姚恰好离京去沪了。王若水抓住这个不用送姚审查的时机，次日即10月14日，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见报了。

## （三）王若水上书毛泽东，状告张、姚

这个版见报后，马上出现两种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有9个省级报纸进行了转载，另有8家省报陆续发表了自己组织的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另一方面，马上受到上海《文汇报》的攻击。当时先由上海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朱永嘉出面打电话给鲁瑛，询问作者是谁？谁组织的？送给什么人看过？他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接着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情况》312期于11月4日刊登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工人们纷纷指责这个版特别是龙岩的文章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工人群众！同时，姚文元给报社看大样小组打招呼，要他们讨论《文汇情况》反映的意见。当问到姚文元自己的意见时，他却谎称自己还没有看龙岩的文章！

报社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姚文元又要他们学习中央文件，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这倒使王若水安下心来仔细翻阅了一批中央文件。他发现由毛泽东批发的批林整风文件就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仅从1972年算起，就有26、31、38、42号文件提到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其中第42号文件是11月4号发出的，比《人民日报》

那个版还晚了20天。不仅如此，姚文元当时直接主持的《红旗》杂志，在11月的11期中，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这样，王若水认为“左”的根子就在张、姚身上，他们这样干，也是在与周恩来作对，但周恩来却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看来只有上书毛泽东才会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决心上书毛泽东反映有关问题。12月5日，他通过《人民日报》机要交通人员把信发了出去。

他当时也感到这事多少有些风险，为不至于连累别人，他这封信并未给任何人看，并且把信的底稿也烧了。后来他回忆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姚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还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说的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会这么快。

我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

我还引了张、姚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姚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指出姚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并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 （四）上书结果，竟惹出一场大祸

王若水上书四天后，于12月9日晚得到通知，要他与看大样小组的鲁瑛、吴冷西及报社军宣队负责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等待首长接见。晚8点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汪东兴共同接见了他们，直到凌晨2点，接见才结束。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先讲话。周态度温和，他说：“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的信，都联系到你提出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后来，王若水还听说毛说了这样的话：“我认识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看来周这次接见时，就是本着毛这句话的精神，把王若水提出的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的。

周接着解释了他8月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至于林的路线，那是右到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

要负责。周还说：“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要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周的说法显得缺乏说服力。看来是他言不由衷，讲的不是自己的真心话。他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张春桥说：“他们讲吧。”于是，王若水接着讲了如下的意思：林彪搞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他欺骗性大，流毒广的是他搞极“左”。这才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以肃清影响。王还回顾1967年主席曾讲过要批判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也讲过批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王还念了中央1972年第31号文件说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还指出，当时形势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当然右的也要注意。实际情况是“左”的危害大。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

王讲话后，江青发言。她说：“你组织的这篇鬼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至于某一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客观上起了挑拨作用。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接着讲了话。他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讲。”张在这里公然撒谎。“四人帮”垮台后，上海工人揭发：以《文汇报》名义召开的那个工人座谈会，完全是张授意的，调子也是他定的。

张春桥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用了我说的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王听到这句话时非常吃惊，并感到糟了！知道自己批到毛泽东头上了！

江和张的发言显然也出乎周的意料之外。后来王若水了解到就在他上书给毛泽东的第二天，12月6日，毛就约见了江青，要她将王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谈话。12月15日和16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的信。12月17日周和张、姚到毛那里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见《周恩来年谱》）可是，张春桥所转述的毛的那些话，说到不要批“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等等，却一直未向周透露过。王若水估计毛有一次对张、姚讲话，时间当在8月8日张、姚去《人民日报》之前，内容涉及他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毛的这个精神只是江、张、姚对外保密的“独家新闻”，不仅《人民日报》不知道，连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了。

接见快结束时，江青说：“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她交代《人民日报》“要展开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可能出来了。”

果然，《人民日报》在鲁瑛主持下，在一位原副总编积极配合下，一场以王若水与理论部为重点的大揭发、大批判猛烈展开了。王若水被免职，被迫到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检查交代。胡绩伟也被迫离职，前往当时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工作了。我被迫离开理论部到干校当工作人员，长期在干校劳动。不仅如此，从此，周恩来也被迫放弃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使《人民日报》完全掌握在张、姚手中了。

王若水曾概述自己对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怀疑和批判的过程。这次接见可以说是从崇拜到怀疑和批判的转折点。在这次会前，王若水一直把江青与张、姚分开来看，只认为张、姚不好，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了，更重要的是，王还认为毛是信任周的，认为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会后王认识到自己错了。王若水说：“真正使我震惊和痛苦的是认识到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近处观察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他们几个明显地在压周恩来，而周恩来处于守势，因为他们后面站着毛泽东。”王若水认识到毛内心是对周不放心的，毛看出周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不同意的。因此，毛正想做的事就是找机会整周。这次王若水的上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整周的机会。王认为“毛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周恩来”。王若水并预见到毛将进一步整周，周的厄运难逃了。果然，不久后毛即批周对美国犯了什么“投降主义”的错误，接着毛又授意江青大搞“评法批儒”批周公，对周极尽影射攻击之能事。直到周含冤去世。

关于毛为什么反对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王若水经过进一步思索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后来我才醒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的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所以，这样批林，势必会批到毛的头上。这才是毛反对批林的极“左”的原因。

王若水认为真正的悲剧人物是周恩来。这个悲剧是由周的性格和他所受的党的教育造成的。他既要忠于毛，严格遵守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又真心实意地想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周却想兼顾。王若水本来想在《新发现的毛泽东》这一巨著中写一章《周恩来的悲剧》，但因癌症精力不济终未写出。直到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这个问题。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